

■ 刘宁 / 著

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

唐宋之際

诗歌演变研究

唐功题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書之傳

唐書之傳

唐書之傳

唐書之傳

唐書之傳

■ 刘宁 / 著

唐宋之際
詩歌演變研究

啓功題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刘宁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9

ISBN 7-303-05687-4

I. 唐… II. 刘…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725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3.625 字数:392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20.00 元

序

葛晓音

进入新时期以来，唐宋诗歌的宏观研究一直以渐进的方式持续地向前发展着：最初的宏观研究只是大概地综合文学史上已知的一些现象，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以后逐渐注意到结合文学发展的外因和内因进行时段研究，但外因的阐述大多还是相关学科的现成研究成果的综述，而不是自己的钻研结果。这种背景研究基本上是大全景式的扫描，实际上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并不密切；再后来才认识到从文学的独特角度审视一切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并深入到原始材料的内部，找出内因与外因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文学的演变过程作出更为切实的阐释。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的过程；特别是随着大批博士论文的出现，很多问题被后来人重新捡起，铺开了总结性研究的摊子。前人的意见被不断地修正，材料的解读愈益细致，得出的结论也就离事实越来越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宏观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尽管唐宋诗的宏观研究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但是刘宁选择“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的这个课题，还是显示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勇气。因为近二十年来，唐诗研究和宋诗研究基本上是两个学术分野，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研究杜诗的角度打通二者，但总的说来，认真地对唐诗和宋诗这两种诗学类型进行比较的工作，主要见于文学批评史领域；而能从创作上说透唐宋诗如何转型的力作还是较为罕见的。从刘宁的学养来看，她本来出身于文献专业，从本科到硕士，接受古文献方面的训练较多；要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唐宋诗的不同风貌及其变化过程，也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刘宁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

《全宋诗》的整理，增加了她对宋诗的感性认识；随我读博士期间，大量阅读唐人诗集，又跟陈贻焮先生学做古体诗词；博士毕业后，随启功先生读“博士后”，还得到了启功、邓魁英、聂石樵先生的指导，既转益多师，又善于吸收，因而能够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不断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提高理论表述的水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90年代以来，研究诗歌演变的博士论文很多；通常的做法是全面综述诗歌风貌的基本特征，再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阐述形成这种风貌的原因。几乎形成一种程式。刘宁则从诸多外因和内因中各取其一，从元白的“元和体”在中晚唐和宋初的创作影响入手，考察唐宋诗歌的转型；同时又找到与“元和体”关系最密切的士人“文官化”的问题，来考察诗歌创作主体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创作实际出发，寻找与这种创作现象关系最密切的外因，而不是泛泛罗列各种外部因素；这种由内向外的思路，避免了外因和内因成为两张皮的粘贴，是保证这类宏观研究能够继续深入的前提。这样的思路，还较好地解决了问题研究和理论框架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一部借用外来理论作为框架，或者以某一条主思路贯穿全书的著作，比较容易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类著作往往依靠先有的理论或思路去阐释文学史资料，有时能对一些常见的问题作出很新鲜的解释，但不一定能以深入发掘问题见长；而注重从文学史的原始材料里发掘问题、提炼问题的思考方式，又不一定能将这些问题的都归纳在某一个理论框架中。刘宁以元白的“元和体”的影响作为考察唐宋之交诗歌演变的主线，并不是事先设定的一条思路，而是通过大量原始材料的阅读，从中晚唐和宋初的诗歌创作中提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她原来的思路是由北宋欧阳修倒溯到五代唐末。在全面分析了唐末五代的各种诗人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创作倾向之后，又发现想说清唐末五代的创作渊源，非上溯到中唐元白的“元和体”不可；而与北宋士人精神面貌密切有关的“文官化”特征的形成也要溯源到元白；这就使内因和外因的两条线自然地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思考这一课题的主线；而当她将思路正过来，由中唐顺流而下时，随着这条主线的展开，又将姚贾诗派、许浑、杜牧、李商隐等中

晚唐的主流诗人以及他们与元和体的关系全面铺开；从唐末五代的全部诗人群体到宋初的白体、昆体和晚唐体，几乎都不能脱离这条线索的干系；这就使作者所理清的这条思路具备了较大的涵盖面，使面和线的关系得到较妥善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论述框架。我一向以为能够从具体问题的提炼上升到理论框架的形成，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建构方式。刘宁走的正是这条路。

由于本书的主思路是从原始材料中发掘出来的一个大问题，因而全书有许多创见，解决和解释了不少以前所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立足于诗体和诗派的长远影响，对元白的“元和体”、晚唐体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新变作出了新的解释，辨清了这几种创作现象之间的复杂纠葛：中晚唐的这些诗体和诗派，前人的研究已经很多，对其基本特征的评价虽然见仁见智，但理解相去不会太远。本书作者则从这些诗体诗派在后世的影响中看出了前人所没有注意的一些变化。她把元白的“元和体”的主要特色归结为追求入实、注重反思、感悟和理趣的特色，认为“元和体”五律以淡语求味、基本上排斥了咏怀的精神旨趣；七律则开拓了理性品质，表现为采用一种经过压缩的散文句式，大量引入反思现实的议论，通过具体的经验领悟人生哲理；绝句发展了感悟人生的理性内容，和工巧的构思。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则将它们放在与“元和体”的关系中去认识，指出姚合较多地吸取了“元和体”的艺术旨趣和表现艺术。姚贾二人虽然都注重苦吟和锻炼，但贾岛求奇，姚合求味，是他们五律艺术旨趣的显著差别。这种差别与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各自受韩愈前期创作和白居易后期创作的不同影响有关。杜牧、许浑则表现出对“元和体”的疏离和反拨。李商隐的七律却接续了白居易“元和体”七律开拓理性品质的努力，并作出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情思并重的特色。在近年来研究中晚唐诗歌艺术的丰富成果中，这些见解以其思路的独特而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对唐末五代诗人群体的分布及其不同的创作倾向作了全面清晰的梳理：唐末五代文学的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诗人的交游和分布的情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近年来虽然有一些研究论著陆续发表，但大多数限于单个作家或“芳林十哲”、“咸通十哲”等当时命名的群体。本书将唐末诗人群分成寒素、贵胄、干谒、隐逸四类，虽然是不尽相同的概念层次，但大体上反映了诗人的不同人生际遇及其近似的创作倾向；至于五代诗人群按地域划分，则不仅是因为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造成地域文化和创作风气的不同，也和各地的文学基础有关。例如南唐诗的繁荣，就因为它有地方诗歌创作的坚实基础，庐山是当时全国有名的诗学中心。经过这样的区划，不但便于看清这一时期诗人的活动情况，而且有利于阐明唐末五代作为诗歌从中晚唐到宋代的过渡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区分诗人群体的基础上，本书又从诗歌各体的创作状况着眼，分别论述了唐末五代的五律、七律、绝句及古体的基本特征。指出五律主要是接续姚合“求味”的旨趣、局限在清雅闲适的一种滋味中；七律主要接受“元和体”和晚唐体的共同影响；绝句则发展了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以上论述没有满足于一般风貌的描述，而是细致地区分了不同诗人群体的不同取向，以及同一类创作传统的前后变异。例如作者认为寒素、隐逸诗人的近体诗直接影响南唐诗人，他们都接受了元和体的入实趣味，但前者较多吸取许浑一派的语言风格，而后者更多地恢复了元白“元和体”中反思现实、感悟人生的理性品质。又如同是接受“元和体”的影响，贵胄诗人由于思想的成熟和对李商隐七律的浸润，在人生的反思中渗透了丰富的感情，以韩偓为代表的七律成为唐末七律最值得重视的艺术成果；干谒诗人则多以讥讽为主，接近元白的开合议论，然而由于器局的限制，讥弹、讽刺多于深邃的思考。这类分析不仅照顾到纵向和横向的联系，而且突出了各群体、派别中最有代表性的或成就最高的诗人，因而能够条理分明地展示出唐末五代诗坛的基本面貌。

第三，在理清诗歌演变轨迹的同时，本书深入探索了这一演变流程的政治文化背景，从士大夫的出处进退这一直接关系到诗人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切入，找到了促使中晚唐到宋初政治环境变化的

主要原因，即文官政治的兴起和门阀政治的衰落。文官制度的观点虽非本书首创，史学家早有论述，但本书作者受此启发，创造出“制度意识”这一概念，来考察政治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于朝野士人的精神状态造成了什么影响，士人们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应当说确实抓住了中晚唐到宋代士人务实精神和理性气质形成的主要原因。

本书不仅通过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士人的“文官化”，而且将这种变化与士人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解释了“元和体”特征的生成原因。作者认为元白在诗里流露的反思现实、沉潜自适的理性气质呈现出一种新的人格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文官政治制度的理性认识，这种制度意识在中唐以后逐渐加强，深化了士人对政治的理性认识，促使士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内敛。在考察“元和体”的影响时，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元和体”与晚唐体之间的中介，认为白居易在晚唐台阁唱和中的核心地位，使元白的“元和体”诗风对台阁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就通过台阁士人对白居易的接受说明了这种制度意识的普遍性。作者又分析了杜牧、许浑等身居州县和幕府的诗人的精神气质，指出他们的理想气质与白居易等人消极制度意识的冲突，是他们排斥“元和体”诗风的根本原因。这又从对比映衬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制度意识的鲜明特点。而唐末五代幕府文人的文官化及其消极发展，则更证明了文官制度意识的逐渐强化。这些看法，都较以前的同类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充分展示了中晚唐到五代士风发展的曲折性和连续性。

正因为全书清晰地梳理了元白“元和体”从中唐到五代的影响，本书最后一章论宋初诗坛的沿革才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关于宋初诗坛的问题，新时期出现过一些较有分量的力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来没有从宋初流行的几种诗体的源头去探讨过它们的发展历史和表现特征。本书论述这一问题可说是水到渠成。前面的源流清楚了，宋初“白体”、“晚唐体”和“元和体”的关系、宋初讽谕诗与元和体的联系和区别自然也就容易解释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提倡平易、革新诗文的意义从诗歌史的角度得到重新认识，各种歧见也

可以迎刃而解。

前面所论固然是本书的主要学术价值所在，但我以为更值得重视的是从作者的思路中透露出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发展苗头。刘宁是 60 年代末出生的学者，除了小学时代受到文革的一点影响以外，所受的基础教育大体是完整的，作为北京市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应当可以代表这一代习文的学生中最好的水平。她的成长过程说明：即使是完全脱离了 60 年代以前传统教育的环境，只要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也还是可以接续古代文化研究的传统。当然这一代学者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学养方面的缺陷。例如本书评论唐末五代的诗学批评，虽然与当时诗歌创作联系起来考察，有其独到之处，但批评似乎过苛。唐末和元代兴盛的诗格、诗式类著作其实是模仿创作的摹本，类似书法的临帖、绘画的画谱，与诗话类欣赏性的批评不同。因此今人评论的尺度也应有所区别。不过这类问题待作者学识积累较多之后，自会有更通达的看法。我更关注的是她对古代诗歌创作肌理的探索。她的论述，没有停留在一般的风格、意境的说明上，而是力求发掘诗歌体裁与表现内容及创作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前面所说作者注意到白居易和李商隐开拓七律的理性品质，与七律的体裁特点有关。又如分析唐末议论性绝句的得失，指出绝句和五、七律议论的不同，认为唐末议论性绝句的不足并非议论这种方式本身的局限，而在诗人思考和语言功力的不足。又如探讨唐末古体的衰落原因，认为诗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关系到古体诗写作的关键素质，这就是由富于理想的心灵所激发的创作冲动和想象力。又如论咏史和怀古的区别，认为咏史更关注对历史做理性的反思，怀古则偏向今昔之慨的情感抒写；又如论诗人的经验和体验是不同的概念，经验是外在的经历，体验是经验在内心的转化，对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诗人的体验；寒素诗人在动荡时世中的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他们对生活遭遇的理解往往不能超越一己的穷通荣辱，不能获得更广阔和富有深度的认识，因而对生活的体验缺少提升的意识。这一类的思考虽然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但透露出新一代学者将进一步突破表面现象的描述，趋向探究深层的创作思理的消息。

最后想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对许多作品的分析体现了作者对艺术的较高感悟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例如说李商隐的《锦瑟》：“在诗人的静观之下，往昔的情感滤尽了它一切曲折的经历，化成纯粹的存在，就像含泪的珍珠与生烟的美玉，美丽而又带着哀怨的朦胧。”说李商隐的《蝉》“一树碧无情”：“诗人仿佛化身为栖息于森森树叶中的一只秋蝉，从弱小的眼中感受到象征着现实的一树碧叶的冷酷与压迫。”又如说吴融的《新安道中玩流水》：“人生中许多因为身不由己而失之交臂的东西，看上去虽然细小，但使我们感受到人生的缺憾和命运中许多难以左右的事物。”作为一本主要探讨诗艺的著作，如果缺乏这类点睛式的、富有启发性的解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作为刘宁的导师，我深知她在这方面是经历了一个苦练和提高的过程的，因而尤其欣慰。当然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的话，我希望这类精彩的段落再多一些，有些论述语言也还可以提炼得更精致一些。文学研究的论著犹如创作，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但使读者愉悦，于自己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这是刘宁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和时下许多出版很快的博士论文相比，它的出台似乎慢了一些。但这种慢速是与质量成正比的。我希望她永远保持这种从容的心态，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交出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本著作。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嘈杂，只要产出的是真正的珍珠，自能在静默中闪光。

引 言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宋诗的异同，以及唐音向宋调转型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发端于南宋，而激化于明清的唐宋诗之争，多数意见都是在尊唐、宗宋之中各执一端，但剥除其中的门户之见，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唐宋诗歌艺术特征的深入分析。^[1]“五四”以后，唐诗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宋诗研究则长期处在比较冷寂的状态中，对唐宋诗异同问题的探讨也受到制约。80年代以后，随着宋代文学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唐宋诗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唐宋诗转型的文学史探讨也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2]

本书希望从唐宋之际的一个特殊时段入手，分析唐宋诗转型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这就是中唐和北宋诗歌革新之间的一个时期，具体起讫是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北宋的仁宗朝。其中上限划在长庆，是因为中唐的诗歌新变以贞元、元和为中心，元和十年以后，诗坛风气已经发生变化。穆宗长庆以后，诗坛风气的转向十分显著，即便是白居易、韩愈、张籍、刘禹锡这些中唐诗歌新变的主力，其诗风也与贞元、元和之际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唐诗歌新变的落潮发生在元和、长庆之际。前人关于中晚唐的分期，存在许多分歧的意见^[3]，有的意见主张将中唐截止于元和末，这与本书的时段划分是十分接近的^[4]。

唐宋之际的这一段诗史，在唐宋诗的转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人早已指出，宋调滥觞于杜甫而胎息于中唐，^[5]而近代以来的有关研究，对中唐和北宋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6]但是，这两个高潮之间的诗歌史似乎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当然，对这一时期诗史上具体问题的探讨并不少见，但将其置于唐宋诗转型的背景进行观察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目前的晚唐诗歌研究，多是单从唐诗趋于衰落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有关五代宋初诗歌的讨论，

则往往简单地将其视为北宋诗歌革新的对立面，这些都没有充分注意到唐宋之际的这段诗史在两个诗歌高潮之间所起的纽带作用，而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种作用做出一些分析。

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段，和唐宋诗转型这样一个宏观的背景，要面面俱到地论述其中所有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像本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本书希望围绕元、白的“元和体”的创作影响这一条线索来展开论述。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元稹、白居易的“元和体”创作，在唐宋之际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的创作原则奠定了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的基本艺术走向。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诗歌革新，虽然直接的否定对象是唐末五代以来的颓靡诗风，但更进一步来看，其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元、白的“元和体”存在着某种深层的联系。在“以意为主”的原则下，欧阳修等人以积极的精神内涵，提升了“元和体”追求入实和注重反思、感悟与理趣的特色，开拓了宋诗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元白的“元和体”之于北宋诗歌革新，并非歧途与正路之别，而是窄径与坦途之分，欧阳修等人接续其旨趣，去其逼仄，而益以开阔。

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面考察有关诗歌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元白的“元和体”在唐宋之际影响嬗变的过程，围绕这一梳理，本书对中唐以下的诗坛进行了新的分期。从穆宗长庆初到唐宣宗大中末为晚唐，在这一时期，元白的“元和体”与后世所谓“晚唐体”的复杂纠葛，构成了诗坛最主要的创作现象。以白居易为核心的一批台阁诗人聚集于京、洛一带，继承了“元和体”的写作风气，表现官居生活的闲适之趣；而后世所谓的“晚唐体”则包括姚贾苦吟诗风和许浑等南方州县幕府诗人的清丽诗风。姚合将“元和体”的求味旨趣与苦吟相结合，与贾岛刻意求奇的追求形成差别，显示了与“元和体”的复杂关系。在远离朝廷的幕府与州县中，以杜牧、李商隐、许浑、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排斥“元和体”的写作风气，用审美的方式寄托精神理想，讲求工丽的语言、情韵的塑造。白居易在会昌五年去世，随着他的谢世，京洛台阁诗人群趋于瓦解；而姚合、贾岛、杜牧、许浑等人基本在宣宗大中年间去世，因此，长庆以来的诗歌风

气，在大中末年基本告一段落。李商隐是晚唐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其创作同样与“元和体”有独特的联系，他对“元和体”的艺术特点做出极富特色的创变，造就了卓尔不群的艺术境界。唐懿宗咸通以后，唐代诗坛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诗史的角度看，咸通到唐朝灭亡的50年，与其后的五代乃至宋初，有更多的连续性，在这一时期，元白的“元和体”的写作风气，逐渐对诗坛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贾岛刻意求奇的倾向逐渐被回避，许浑等人清丽的艺术趣尚则逐渐与“元和体”发生融合。在宋初诗坛，元白之“元和体”的流行成为最为重要的创作现象。基于这样的考察结果，本书又将咸通以后到北宋诗歌革新前的诗坛分为唐末（咸通到唐亡）、五代、宋初三个时期。

围绕艺术流变的梳理，本书还讨论了晚唐、唐末以及五代有关诗人群体的构成和创作特色、对唐末五代诗歌理论的特点做出了分析。在对唐末五代诗人群体的划分中，本书并没有单纯依据诗人具体的交游关系来划分，而是综合考虑了诗歌艺术追求和诗人的具体交游关系等因素。对唐末五代诗歌理论的分析，也紧紧围绕创作中出现的现象来进行。

在梳理诗歌艺术流变轨迹的同时，本书也试图对这一流变轨迹的成因做出分析。晚唐以下，诗音衰飒，那么，为什么这种衰音恰恰以“元和体”影响日趋显著的方式体现出来呢？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一次吸引了我们。

晚唐五代宋初，士大夫精神日趋萎靡，这固然是一种衰世的症候，但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衰世屡屡出现而表现却个个不同，在唐宋这个独特的时代转捩之际，政治和思想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士大夫究竟因为什么现实原因而因循萎靡，其因循萎靡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都是值得细致思考的问题。

唐宋转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涉及方方面面，而政治上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门阀政治的衰落和士大夫文官政治的兴起。尽管真正比较成熟的文官政治是在宋代才建立，但文官政治制度却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正是伴随着门阀势力的削弱而出现的。中唐以后，一方面门阀势力迅速衰落，文官政治制度加快发展；另一方面，

文官集团和宦官、藩镇发生激烈的矛盾，随着皇权、宦官和藩镇专制的加剧，文官集团越来越丧失对政权的支配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以下宦官和藩镇与文官集团的矛盾，虽然对文官政治的建立有很大的阻碍，但仍然为文官政治制度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就是在宦官形成绝对专权的唐末，科举制等一系列文官政治制度并没有被废除；五代政权从本质上讲是藩镇专政，但文官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仍然得到延续，甚至有一些新的建设。这与门阀势力从根本上反对文官政治制度的态度是不同的。宋代文官政治的成熟，源于门阀势力的彻底崩溃和宦官、藩镇势力退出权力中心，但其文官政治制度的建设却并非初生乍起，而是接续了唐代以来长期的制度积累。

文官政治制度的缓慢发展与文官集团越来越丧失对政权的支配力量，这两者的反差，构成我们认识晚唐以下士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时事背景。由于自身逐渐退出权力中心，晚唐以下的士人精神日见萎弱，但另一方面随着门阀势力的进一步衰落，文官政治制度不断有所发展，士人的“文官化”特征也逐渐强化。所谓士人的“文官化”，是指充当“文官”成为确立士人身份的核心要素，士人的生活、情感与为官的愿望、经历发生密切的联系。^[7]“文官化”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制度意识的强化。所谓制度意识，是本书尝试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内涵是指对政治制度的理性认识。制度意识是唐宋文官政治所培养的“文官化”士人不同于传统士人的关键所在。由儒家思想所培养的传统士人，一向有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传统，但一个成熟的“文官化”士人，既需要有热烈的政治理想，也要有深厚的制度意识，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在政治制度中的位置，务实而理性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务实和理性是制度意识的核心，这种素质倘若与积极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就会激发出积极的现实精神与成熟的理性思考，但如果伴之以消极的政治态度，则会流为平庸安分的处世趣味，理性思考也会带上价值虚无的色彩而丧失开阔的格局。中唐以下，士人制度意识的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但是，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文官集团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皇权、宦官和藩镇的专制阴影下，难以激发出积极

主动的政治热情，因此他们的制度意识就带上浓厚的消极色彩，越来越安于充当备位守常的制度工具，陷入平庸自适的趣味，丧失了担当天下事的政治家气魄。元白之“元和体”所流露的安分自足的务实趣味，以及价值虚无的理性思考，就是元、白等人消极制度意识的流露，而元和体的流行，也与消极制度意识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日见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北宋诗文革新中的欧阳修等人，在文官政治巩固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克服了晚唐以来士人制度意识中长期流行的消极色彩，使士人的“文官化”由消极的状态转向积极，而这正是他们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和开拓“元和体”艺术品质的关键原因。

晚唐以下，士人的“文官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晚唐各派政治力量犄角斗争的状态中，幕府与州县，成为制度约束相对薄弱的空间，其中尤其是幕府的文职僚佐，在相对自由的幕府环境里，更多地体现出“文人才士”的身份特征，对京洛官场中流行的消极制度意识并未有多少沾染。^[8]唐宣宗大中以后，晚唐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皇权、宦官、藩镇的专制控制依次加强，幕府、州县等宽松的环境趋于消失，随着藩镇的政权化，放旷不羁的幕府文士，逐渐转化成因循守常、精神平庸的文臣，伴随着浓厚的消极色彩，制度意识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士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状况到北宋庆历年间才有巨大的改变。

从文官政治制度不断发展与文官集团逐渐丧失政治权力的反差、从士人“文官化”程度的提高与“文官化”的消极状态来观察中唐以后的社会、政治状况，只是观察唐宋之际政治演变诸多视角中的一个，这个视角不可能照顾到唐宋政治转变中的所有问题。比如，门阀势力的衰亡，对于认识中唐以后士人的精神面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文官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在中唐以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门阀的衰落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以往有不少史学研究关注中晚唐门阀势力消亡的具体过程，这种研究很有意义。^[9]本书没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认为它不重要，而只是希望将笔墨集中在感触最深、与所发现的艺术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现象上。

本书采取了综合性的研究视角，^[10]但不是一部全面描述式的诗歌

史，无论是从元白的“元和体”的影响出发梳理诗风流变，还是从文官政治制度的发展对士人的影响来分析诗风流变的外因，都是就最有体会的问题来讨论。当然，这些问题的提出，来自我对唐宋之际诗歌文本的阅读体会，对这一段诗史的全面考察，和对其在唐宋诗歌转型中意义的思考。不同的人观察这段诗史，思考唐宋诗歌转型的问题，必定会有不同的角度，发现不同的问题，我希望自己的想法，能进一步引起大家从唐宋转型的角度观察晚唐五代宋初诗史的兴趣，能为新的思考和探索提供一点帮助。